

## 鲁迅小说的非小说倾向

陆葆泰

鲁迅小说,开中国现代的白话小说之先河,从思想和艺术方面讲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是一柱成就卓然的丰碑。这,应是无庸置疑的。但是,如果用辩证的观点来看,问题还有另一个侧面。由于它毕竟是早期的东西,必存在着不够成熟的一面。关于作品特征上的这一侧面的问题,实际上,鲁迅先生自己也一再实事求是地表白过,他曾说:“《狂人日记》很幼稚,而且太逼促,照艺术上说,是不应的。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,现在的乱嚷,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 226 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 81 年版)他又说,在做小说的时候,“单在描写社会上的一种生活,请读者看看,并没有别的深意。”(《孔乙己附记》)本文,就此问题谈些有关认识。

### 一、非小说倾向举隅:

什么是小说?或曰小说有哪些不同于其他体裁作品的主要特点?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云:“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、叙述故事为主的文学体裁。它的主要特点是,细致而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性格;生动而完整地叙述故事情节;充分地、多方面地展现人物活动的的环境。”(上海文艺出版社 84 年版)。这个小说定义及有关阐述告诉我们,小说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:一、人物形象和故事是小说的主要内容;二、人物、故事和主题的关系为,主题主要通过人物揭示,而人物又是通过具体、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;三、情节是由一系列展示人物之间、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事件、细节所组成。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,小说的情节具有完整性、生动性和复杂性。如果以上认识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基本特征的话,那么以此考察鲁迅小说,我们就会发现,鲁迅小说存在着一系列游离于小说特性的现象,倘予归类,大致上有以下数种。

其一,有的作品不以塑造人物、叙述故事为主,而似往日一事件的回忆录。例《社戏》,全篇之中心似一成人在回忆童年的一个活动情景,即看社戏之前前后后的过程。《鸭的喜剧》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友人家从养蝌蚪到养鸡,以致养鸭的一段往事。《头发的故事》,全篇基本上为 N 君之谈话记录,讲其剪辮后周围人的态度及其应付措施,他对学生们的关于剪辮提问的回答及有关讨论。《兔和猫》写邻居三太太之乳兔为猫所叼这区区小事。又如《药》中之华老栓和华大妈两人物,个性分得清么?通篇只是写事情经过。

其二,有的作品无完整、生动的情节,若以戏剧作品来作比较的话,它们够不上一内容充分、起承转合层层清晰推进之独幕剧作,它们被称之为戏剧小品似更恰当。例《一件小事》写一老妪在一人力车前跌倒后,“我”与车夫的不同态度及由此而得到的精神触动和启发。《故乡》写“我”的幼时挚友——农民的孩子闰土幼时和中年时的不同的举止外貌。全文主要仅两个镜头:对于闰土幼时之回忆镜头和“我”由外省回家进行闾家迁居时目睹闰土现状的镜头。其他如《明天》写粗笨的农村妇女单四嫂之重病独子求医终未获救的一段故事。《风波》写撑船人七斤带回张勋复辟之信息,从而在晚饭时刻引起的一点小小的惊动,由于张勋复辟本身是螳臂挡车不自

量力的蠢举和一个极其短命的事件,所以次日即风平浪静。《白光》写陈士成落第,出现反应性精神病以至落水致命的故事。以上作品或无事件,或通篇仅一个简单事件,自然无所谓一波三折之状,也必无情节之完整、生动可言。

其三,有的作品,人物不能反映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。《狂人日记》是一篇用象征方法写作的作品。它的主题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,但,由于作品之内容并未具体表现主人公致狂与家族制度或礼教之关系,小孩子、老大夫、照顾狂人的男佣陈老五,即使狂人之大哥及赵贵翁等一些人物,在作品中也缺乏确凿的行为细节以表现他们在造成“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,因而,狂人之周围环境并未呈现出什么真实的弊害足以使狂人致狂,足以令狂人益狂。相反地,从通篇上观看,狂人确为狂人,所以《狂人日记》在表面气氛上,作者似乎也造成了令人窒息、逼人致疯之景象,它的不少言语,如“我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天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”!又如“没有吃过人的孩子,或者还有?救救孩子……”这些认识,在五四前诚属深刻,作为杂文来表现,实为上品,但用到小说中,在对立形象均尚未饱满及构成对立关系的状况下,它们就只能成了离题而发的作品之外的议论了。又如《阿Q正传》,鲁迅先生欲写出“我们国人的魂灵来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81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),欲写出“国人的魂灵”,阿Q起码应是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国人,但作品中的阿Q是否合乎此要求呢?如果我们细读作品就会发现,结论是适得其反的。阿Q是个智商较低的、近乎于傻瓜的人物。人物的这个特性,从作品开头之数章中已露端倪。阿Q的情感反应是极其幼稚的,例如挨了囚人之打了,阿Q是心里想“我总算被儿子打,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……”然后,竟心满意足了。阿Q的道德标准也是欠正常的。其见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,被锣鼓报喜时,竟附龙攀凤地企图与人挂上亲戚关系,以此招摇过市,哗众取宠。阿Q的是非识别能力同样极其低下,摸小尼姑之头皮,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捏女人之大腿等等,阿Q的这些行为也许会偶而在常人身上发生,但它只能是偶而至近乎于零,如接连发生,斯人之智商必定有损。一个智商不健全的人,决定其不能成其为国人之典型,因而无论作者和评论者如何一再强调该点,阿Q仍不能反映出“国人的灵魂”来。

其四,鲁迅小说中的不少人物,由于过于缺乏其心理及行为的细致描写,因而时常令人只见其粗略的几支骨,而不见其血肉。例如《阿Q正传》中的把总,是杀害阿Q的决定者,此人理应给人些形象感了吧,可作品仅两处提到他,一处为一句“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”,一处为与举人关于追赃第一与示众第一之矛盾的百余字的叙述。举人亦然。对于他们的笔墨,可以说只能算创作提纲中之点要。又如描写假洋鬼子,主要有三处,第三章简介其人和其给了阿Q几棍,第七章描写其被赵秀才约去尼姑庵,打了老尼姑几下和砸了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的龙牌等;第八章约二百来字的其对自己活动的叙述和驱逐阿Q的两句喝斥。仅这些笔墨,很能令人物栩栩如生的。

其五,脱离于作品主体的赘文横生,篇幅辅张。《孔乙己》之开头部分,作者用了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绍酒店详情及“我”的从业状况。若有些内容欲作为环境描写保存的话,也只三言两语足矣。有必要用这样的大比例的篇幅么?《祝福》亦存此短。关于《药》,其尾声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病人吃药死去后的情节,而且作者最着力表现的东西,也在这一部分。这样,作品就必然给人以如此的感觉:该作仿佛是在作者总体构思未完成的情况下起笔的。

鲁迅小说之非小说倾向,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。其一,如前所述,例《狂人日记》等,影响了主题的准确表现。其二,影响了主题的深化。科举制度害人非浅,这是明末吴敬梓等作者已有形象而入木反映的主题,《孔乙己》对该主题超越了么?作者搜取了一些关于人物孔乙

己的生动细节,将其排列于作品中。在细节的搜取中,作者又注意了其多样性;迂腐的、善良的、善良中带迂腐的,迂腐中带愚蠢的,迂腐并虚弱至极的,因而人物既有基本特征又带有变化,个性有立体感。但由于作者忽略了将人物与其他人物建立起一定的关系,在特有的人物关系中展示个性,表现主题,因而作者在选择及表现主题时,很容易顺着前人已有的认识推进。其三,影响了题材的拓广。鲁迅小说的量并不多,但内容已多有重复。例《阿Q正传》中假洋鬼子之留学、剪鞭、装假鞭,以手杖示威等行为与细节,和《头发的故事》中之N先生完全相同;《阿Q正传》之示众场面中围观群众之麻木状,也宛如《药》之示众描写之小变奏。新鲜性与奇特性之小说必具特点,而重复必会令读者乏味。

## 二、倾向之形成及认识意义

导致“照艺术上说,是不应的”之原因,大致有以下几大方面:一、既为发端,前无实践上的参考物,同步者之助力又很少。二、战斗形势所迫。鲁迅先生说:“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‘文苑’里的意思,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,来改良社会。”(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)他又说:“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,是挤出来的。”(《〈阿Q正传〉的成因》)“但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们却一回一回的来催,催几回,我就做一篇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51页,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)三、与之相联的,是作者在创作前,存在着无足够的时候上的准备的问题,鲁迅先生在创作《狂人日记》前,仅看过“百来篇外国作品”,(同上)而它们又被局限于“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。”所看的俄国,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。在阅读时,也并非为创作之准备,他说:“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,注重的倒是在介绍,在翻译。”“看短篇小说却不少,大半是自己也爱看,大半则因了搜集介绍的材料。”至于创作理论上的准备,那就更为不足了。鲁迅先生说:“‘小说作法’之类,我一部都没看过。……也看文学史和批评,这也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,以便决定应否介绍中国。和学问之类,是绝不相干的。”(均自《鲁迅全集》四卷511—513页)。四、与鲁迅先生的思维特点有关。这一点应说是带根本性的。“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……”其表明鲁迅先生主观上并未企图充分发挥小说的形象思维特性,而且是偏重于直接的社会效应,所以必重视说理。而从鲁迅的创作全历程来看,似乎说理的迫切性,令作者经常在创作中偏离小说的特点和方法。

我们以为,认识该问题十分必要。第一,它有利于辩证唯物论的推广。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,那么,放在鲁迅小说的研究上,也该应验。目前,不少人往往把鲁迅小说的研究当作禁区。实践检验之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方法对其他一些作家和作品通行,鲁迅小说却成了例外。所以,有人虽感到鲁迅小说不像小说。例林非的《〈呐喊〉中的散文》(载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83年第2期)没有深入地加以探讨。第二,有利于中、青年作家科学地认识鲁迅小说,认真地借鉴鲁迅小说。鲁迅小说,尽管有其不足,但瑕不掩瑜,不少篇章仍不愧为杰出之作。它们在主题的开掘上,在典型细节的运用上,在语言的精练上和个性化上,都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放射着耀眼的光彩。如果我们辩证地分析鲁迅小说,创作家就会心悦诚服地接近这些作品。如果我们只是十分片面生硬地来谈论鲁迅小说,那么创作家们就将从不信服我们的理论起步,继而疏远鲁迅小说。中国当代文学若缺乏对现代文学的借鉴,就不可能走出具民族特征的文学之路,就不可能出现如魔幻现实主义一类水平的作品。第三,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送。第四,它启示我们,作者应通晓有关创作理论。鲁迅小说的非小说倾向告诉我们,即使如鲁迅先生这样的思想深邃、才气横溢的一代大家,在缺乏充分技巧准备的前提下搞创作,亦会发生才气展现受障、深刻的认识难以形象地表现的现象。它使我们十分具体地感觉到,王蒙先生说的作家应同时是学者的认识不无道理。重视技巧的研究,理所当然地是每个有志气、有抱负的作家的必经之道。